

【历史研究】

10—13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僧侣往来与中西文化交流*

杨 蕤 田 文

摘要:宗教交流是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西域、河陇、河湟以及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僧侣进入中原,或进行贸易谋利,或进行宗教活动,或充当外交使臣。以佛教僧侣为主的宗教信徒以及西来的婆罗门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教徒在陆上丝绸之路处于衰落低谷的背景下,行走于丝绸之路上,维系着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持续畅通,丰富了中西宗教交流的内涵,彰显出沙门僧侣在沟通中西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

关键词:五代、北宋;陆上丝绸之路;僧侣;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6-0114-07

唐朝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学术界不大关注的领域,这种局面概有多重缘由,但有两点必须提及:一是帝都东迁后,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呈现出衰落之态是不容置疑的,与汉唐时期丝路的繁荣盛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是研究资料的欠缺。唐后期中原王朝失去了对西北及西域地区的有效经营和管辖,陆上丝绸之路的具体细节未能充分进入中原史家的记录范围,无疑成为今人认识10—13世纪西北社会及陆上丝路状况的巨大障碍。宋代史家及仕宦文人对西北及西域地区的记录尤为稀少,根据笔者粗略估算和统计,《全宋笔记》关涉西北地区的史料文献不及全部资料的2%^①,显然西北地区以及更西的区域已非宋人关注的重点。这无疑增加了梳理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史实的难度。可喜的是,近20年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和相关文物考古资料的刊布,以及近年来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回潮”,学界逐渐揭开了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梳理出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归纳出时代及地域特点,考订出一些断面性、细节性史实,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②即便这样,10—13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中仍有不少薄弱环节尚待深入探究,丝路僧侣就属此类论题。本文在梳理汉文史料及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拟就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僧侣人员的构成与来源、僧侣活动的基本内容、僧侣之于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等内容略作探讨,尽力呈现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僧侣的基本面貌,以期对丝路史、宗教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有所补益。

一、僧侣人员的构成及来源

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一书中指出:“我国在唐末悟空西行,般若东来以后,国乱相寻,西域道梗,佛教上中西交通几全断绝(仅唐庄宗时有于阗胡僧来中国至五台)。及至宋初,国威稍振,而求法传道之事渐多矣。”^③此论断也能获得文献资料的佐证,在经历唐末的社会动荡和战乱后,从五代开始确有僧侣活动于陆上丝路的信息。笔者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检索出有近五十条关于丝路僧侣的记载^④,虽在文献检索中必有遗漏,但能大致反映出10—13世纪陆上丝

收稿日期:2022-01-27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宋元笔记中的西北民族史料整理研究”(18XMZ012);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

作者简介:杨蕤,男,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银川 750021)。

田文,男,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博士生(银川 750021)。

绸之路僧侣人员构成和来源的基本面貌,并可归纳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来源广泛。10—13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西来僧侣主要来自四个区域,即西域、河陇、河湟以及域外地区(南亚、西亚)。当然,也有一些中原僧人西行取法交流,但史籍记载的数量较少。在这几个区域中,以来自西域和河陇地区的僧侣活动最为频繁。五代以降,西域及河陇地区呈现出群雄割据的局面,党项、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割据其间,西域地区则有高昌(西州)回鹘、龟兹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等割据势力。这一政治关系情势亦可以从僧侣在陆上丝绸之路上的活动中表现出来,如于阗、西州回鹘、龟兹回鹘^⑤以及甘州回鹘、沙州、秦州回鹘、唃廝囉等政权或势力曾以官方的形式派遣僧侣出使中原。域外地区的宗教徒远不如西域河陇地区僧侣频现丝路古道,但还是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如文献记载西州使臣与波斯外道以及婆罗门僧永世一同入贡^⑥。这里的波斯外道指的是来自西州回鹘的景教徒。在宋代史料中,将景教称为“外道”^⑦,与佛僧无涉。有迹象表明,在西夏的京畿地区亦有信仰景教的信徒,^⑧他们似乎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常客。文献还提及婆罗门僧人^⑨,唐代文献中尚有不少“婆罗门僧”的记载。严耀中先生认为唐代的“婆罗门僧”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婆罗门种姓出身的佛僧,但有明确身份而被称为婆罗门僧的比较少;另一种是能咒术或善医药之天竺异僧,当是传播婆罗门宗教文化的婆罗门教徒,^⑩即今天的印度教徒。《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有《婆罗门僧服仙茅方》一卷,应是医药著作,证实婆罗门僧确实善医药。宋代文献中的婆罗门僧应与唐时情形大体相同,但具体是指佛僧还是印度教徒,因信息极为有限,尚难明辨。

10—13 世纪丝路僧侣来源地的地理范围不仅覆盖了整个西北地区,还囊括了部分中亚乃至南亚地区,由此也表明,即便在陆上丝绸之路较为冷清的五代、北宋时期,西来僧侣仍不绝于丝路道上,甚至不时出现远道而来的天竺僧人,例如后周广顺三年(953),西天竺僧人萨满多入贡中原。^⑪在汉文史籍中,根据地理方位将天竺分为五个部分:“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去京师九千六百里,都护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岭南,幅圆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⑫西天竺大致处于距离西域较近的区域,因此僧人萨满多应

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原。于阗使臣曾言:“本国去京师九千九百里,西南抵葱岭与婆罗门接,相去三千余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余里。”^⑬文献中婆罗门的地理方位大致与西天竺相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记载了一位中天竺僧人法天到鄜州译经传法^⑭,鄜州即今陕北延安地区,法天显然也是从陆上丝路通道而来。

第二,名实俱备。因受到地缘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中原史官对于丝路僧侣的记述较为简略,但记述的模式大致相同,不外乎三大内容,即“时间+人物+事件”的模式。具体讲就是僧侣的活动时间及所属国、僧侣及使团、朝贡物品及目的等,即何时、何人、何事。虽然史籍中有关丝路僧侣的信息不过寥寥数语,但多确载僧侣姓名法号,从中也能判断出僧侣的身份。例如来自西域地区的僧人有:满多、缚啰、法渊、善名、善法、吉祥、智圆、密坦罗、义修、华严、法吉祥、善称、阿侯忽伦、忽都兔王;来自河陇地区的有:兴赉、惠崇、法胜、宝藏、正会、法仙、翟、哈尚、法光、法会、惠藏;来自南亚等域外区域的有:萨满多、阿里烟、号永世、智军、爱贤、智信、迦啰吃哆。此外,还有来自河湟地区的两名僧人景遵、马取逋厮鸡。不少西来僧人拥有自己的法号,如法仙、法光、善法等,但也有几位僧人并没有法号,史料直示其俗名,如马取逋厮鸡、阿侯忽伦、迦啰吃哆等。^⑮无论是来自西域河陇地区的回鹘僧人,还是来自印度西亚的异域僧人,多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法号。另有一些法号为其进入中原地区后所得,如景德元年(1004),沙州僧人惠藏请求宋朝赐予师号,得到宋廷的允诺。^⑯文献中尚有比丘尼入贡的记录:“(景德)四年,又遣尼法仙等来朝,献马。”^⑰这是北宋陆上丝绸之路比丘尼活动的少有记录。

正因为丝路僧侣来源广泛,如何认定僧侣的身份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就文献记载所及,以上列举的僧侣基本为佛教僧侣,这一判断是基于以下四点考虑:一是名号。如前所述,多数僧侣有明确的法号,即便没有法号的,文献也称其为僧。二是贡物。西来僧侣所贡之物与佛教有关。如乾兴元年(1022),“龟兹国僧华严自西天至,以佛骨舍利、梵夹为献”^⑱。佛骨、梵经、菩萨像、菩提印多为此类贡物。三是活动内容。西来僧侣或向中原政权乞赐佛经和紫衣,或赴五台山等佛教名山瞻礼。四是历史背景。除了摩尼、摩尼和尚、波斯外道等明确为非

佛教僧侣外,容易引起学界质疑的就是文献中的于阗僧人是否为佛教徒,因为这一时期的喀什、于阗等地民众信奉伊斯兰教。笔者认为宋代文献中的于阗僧应该是佛僧而非其他宗教徒,因为西夏时期东天山地区或者说高昌回鹘所辖的范围内一直以佛教为主,直到西夏灭亡,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11 世纪甚至到 12 世纪,于阗的宗教信仰仍以佛教为主,¹⁹五代及北宋时期回鹘及西域僧人频繁进入中原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反映。

第三,交流不绝。从五代到北宋灭亡共 220 年的时段里,僧侣不绝于丝路古道,最早的记录为后梁贞明元年(915),最晚的记录发生在北宋重和元年(1118)。若以 1038 年西夏建国为界,可以明显地看出僧侣往来频次的差异:西夏建国前有 35 次,建国后则不及 10 次,这一特征与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朝贡贸易的频次完全一致²⁰。僧侣往来频次的减少概有国家间外交及宗教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西夏崛起后,割据西北,影响了河陇及西域诸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与交流,这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即便这样,中西交通仍未断绝,也就是说,纵然在群雄割据的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仍然发挥着宗教交流的功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西域、河陇僧侣入贡中原的同时,也有一些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文献记载的就有道圆、行勤、辞瀚等僧人。中原史家对一些中土僧人西行的记录就较为详细:

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晋天福中诣西域,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开宝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²¹

道圆在西域及印度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²²,行勤则组织了一百五十多人的使团西行求佛,行踪所及今天河西走廊、南疆等地区,甚至到达大食国,即喀喇汗王朝境内。²³

西来僧侣由丝路进入中原的方式有二:一是多以搭“顺风车”的形式随朝贡使团一道而来,如景德

元年,甘州回鹘夜落纥遣进奉大使、宣教大师宝藏等一百二十九人入贡北宋。²⁴二是僧人独立成团前赴中原。如淳化二年(991),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来献。²⁵天圣五年(1027)僧法吉祥等五人来献。²⁶虽然文献中只提及某僧人前来朝贡,但笔者以为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两个僧人只身而来,因为必须考虑到陆上丝绸之路的艰辛、自然环境的艰苦、朝贡品以及回赐品的运输、路途的危险、偶患病痛等客观因素,单靠一两个人恐怕难以完成长途跋涉的丝路旅程,因此多数情况下丝路僧侣多是结伙而行。

二、僧侣活动的基本内容

第一,商业贸易。通过入贡谋取商业利益是西来僧侣进入中原的主要目的。僧侣的贡品主要有马匹、琉璃器、胡锦、水晶器、玉石、琥珀、阿魏子、佛牙、舍利、梵夹、菩提印叶、念珠等,多为世俗用物和宗教用品。其中一些贡品为西域、河陇地区所产,如马匹、良玉、毛织品之属,但也有异域流入的贡物,如琉璃为中亚所产,琥珀产于欧洲及东南亚地区,具有外来商品的特性。文献中甚至有于阗僧人进贡舞象的记录²⁷。一般来讲,大象应为东南亚等热带地区的动物,林邑、真腊等曾向唐朝进献过大象,但从西域和中亚地区献象的情况极为少见,公元 746 年,呼罗珊或河中地区某座城市曾向唐朝献象。²⁸僧侣们用这些物品换取宋朝的金银器和丝绸缯帛,以博取厚利,尤其是中原地区的丝绸制品颇受欢迎,如《马卫集论中国》一书中讲道:“摩尼教徒 Bihāfariolh 曾从中国带回一件绿衫,它折叠起来后,几乎可以捏在一只手的手心里。”²⁹事实上,宋朝也十分清楚西来僧侣入贡谋利的目的,甚至出现过与僧侣们“讨价还价”的现象:“罗撒温等以献物赐直少不受,及请所献独峰橐驼。诏以远人特别赐钱五千贯,以橐驼还之,而与其已赐之直。其后数以方物来献。”³⁰一些僧侣进贡的物品数量十分庞大,如“太平兴国五年五月,中天竺国僧啰护啰来献香药七千斤,贝多叶梵经一轴”³¹。又大中祥符三年(1010),龟兹僧人智圆“贡琥珀四十五斤,碯石四十六斤”³²。面对这种情况,宋朝不得不在秦州等地设卡检查,限制僧侣进入中原,“诏秦州,今后蕃僧进贡止绝,不得发遣”³³。可见一些僧侣贸易谋利的目的十分明显。

僧侣经商谋利,并非宋代独有的现象,如在唐、五代的小小说随笔中就屡见长安僧人将“宝物”售给

西域胡人的故事,所售货物有“宝骨”“青泥珠”“水珠”等。³⁴北宋社会存在着较普遍的“趋利”思想,普通民众对“金钱”“利益”的追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³⁵对宋人逐利这一现象最经典的评价莫过于北宋权臣蔡襄的名言:“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³⁶在此影响下,寺观僧人从商重利的风气甚浓,寺院兼做商业场所,大有超迈前朝之势。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薙(剃)乃成礼。”³⁷僧侣们入世经商的动力超越了佛教的清规戒律,甚至影响宋朝士人们对僧人以及佛教的态度。僧尼还通过贩卖日常用品、占卜医药,甚至走私货物等手段聚集财富,其中不乏因商而富的僧侣。³⁸当然,北宋政府出卖度牒,变相谋利的做法更是助长了僧侣从商的行为。谢和耐先生就曾指出:如同在唐代一样,为了满足一时之需要而提供资金,(宋朝)统治阶级决定发放度牒。当时还向出家人出售尊号,尤其是出售“紫衣”的尊号,不少西来僧侣就获得了宋朝所赐的“紫衣”尊号。³⁹虽然我们还不能断言宋代浓重的商业氛围、普遍的逐利心态与丝路僧侣入贡中原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丝路僧侣竞相前赴宋朝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宗教交往。西来僧侣通过陆上丝路前赴中原也有宗教交往的目的,如一些僧侣前来乞赐佛经,景德四年,沙州僧正会请诣阙,以延禄表乞赐金字经一藏。⁴⁰宋熙宁元年(1068),回鹘入贡,求买金字《大般若经》,以墨本赐之。⁴¹还有一些僧侣向宋朝提出赐予他们修缮佛寺所需的资金及建筑技术,如景德元年,沙州政权派遣僧人惠藏,向宋朝提出修建佛寺需要金箔十万,并请宋朝派遣铸钟等工匠前去帮助指导。⁴²此类僧侣所进献的物品也多为宗教器物,如佛牙、念珠、梵夹、佛骨、铜像等,更有僧侣进贡舍利。⁴³这些僧侣的交往内容大致继承了前代丝路宗教交流的传统,如唐人就对舍利这类宗教圣物表现出惊人的热情,甚至能在集市上卖到大价钱。⁴⁴后唐天成年间,“有僧于西国取经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呈上”⁴⁵。当然,众僧中不乏一些真正醉心佛法、潜心佛学的僧侣,如“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觉称来,馆于传法院,其僧通四十余本经论,年始四十余岁”⁴⁶。又“开宝七年,知鄜州王龟从表上

中天竺摹伽陀国僧法天、河中府梵学僧法进所译《圣无量寿》《尊胜》二经、《七佛赞》。诏法天等赴阙,召见”⁴⁷。

中原僧人西行求法,西域僧人东来传道布法,东西宗教互促交流是中国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传统。刘迎胜先生认为唐代龟兹大云寺系因长安大云寺而建,故龟兹大云寺寺主秀行很有可能原来是长安怀远坊大云经寺的那个“七宝台”中的僧人,庄严寺等寺观亦源于长安。⁴⁸甚至有不少流寓长安的西域僧人,如名僧慧琳,亦姓裴氏,为西域疏勒国人,元和十五年(820)卒于长安西明寺。⁴⁹10—13世纪亦有不少驻足中原的西域僧人,《鸡肋编》卷上载:“汝阴颍上县,与寿春六安为邻,夹淮为二镇,号东西正阳。其西属颖镇,城之中有砖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载其与僧伽俱来,终于正阳。”⁵⁰北宋时期的颍上县属京西北路,寿春和六安属淮南西路,二者隔淮河为邻。西域僧人圆寂东土,未归故里,其足迹已及首都东京以外的区域了。

第三,政治活动。西来僧侣进行朝贡贸易不单是纯粹意义的宗教或贸易活动,同时带有一定的政治性,或者说他们也充当了外交使臣的角色。西来僧侣朝贡需要官方的许可,进入中原必须遵循中原王朝的外交礼节,甚至住宿场所都有严格的礼仪之规,“其大辽使人,在都亭驿,夏国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纥、于阗在礼宾院。诸番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⁵¹。在与北宋交往的过程中,西来僧侣还特别会利用传统的“政治资源”,尤其强调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甥舅之谊”:

广顺二年十月,沙州僧兴赓表辞回鹘阻隔,回鹘世以中国主为舅,朝廷亦甥呼之。沙州陷吐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后唐同光中,长史曹义金者遣使朝贡。灵武韩洙保推之,乃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使。其后久无贡奉,至是遣僧辞其事。⁵²

单从字面上判断,上述文献讲的是因回鹘阻隔而沙州停止贡奉,故派遣僧人兴赓向宋朝通报此事,但其背后并非单纯的宗教事务,而是要恢复宋朝与沙州之间的联系,僧人兴赓行使的无疑是一项“外交任务”。西来僧侣还通过一些佛事活动来拉近与北宋高层的关系,如于阗国僧人就曾为神宗皇帝饭僧追福⁵³。甚至有一些西域胡僧借助佛法乞降甘霖,以减旱情,如“神宗时旱,一西僧咒水金明池,云

气蔽水如墨。僧云:‘罗义神灾劫重,战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于某日内,东门降雨数点而已。’果如其言”⁵⁴。

此外,一些西来僧侣借入贡中原的机会游历名山大川,如回鹘僧哈尚就曾请求前去五台山瞻礼观光⁵⁵,又如“光天元年春三月,西域胡僧满多三藏来游峨嵋山,却归西国”⁵⁶。印度僧人迦罗吃哆乞宣取在游历名山大川后,还创作了《名山百花图》献给宋朝。⁵⁷当然,宋朝政府也十分注重对西来僧侣游历信息的收集,判鸿胪寺宋郊曾言:“请自今外夷朝贡,并令询问国邑、风俗、道途远近,及图画衣冠、人物两本,一进内,一送史馆,委修撰官依传题记。”⁵⁸一些西域僧人甚至成为大宋皇帝关注的对象,例如宋太宗谓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国来,表述本国金刚坐,乃释迦成道时所踞之坐,求立碑坐侧。朕令苏易简撰文赐之,中有鄙佛为夷人之语,朕甚不喜。”⁵⁹

上述三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显现出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丝路僧侣既有贸易牟利的目的,也有与宗教相关的活动,还有一些僧侣参与政治活动,承担着外交使臣的重任,极具复杂性。二是就文献记载所及,丝路僧侣在商业贸易方面的目的和诉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政治活动的情况就需要审慎辨别,不排除一些鱼龙混杂的僧侣借助政治的幌子来达到逐利的目的,宗教交往则大致介于二者之间。

三、僧侣对陆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在唐末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的背景下,僧侣们并未停歇在丝路上的来往交流,成为维系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一支重要力量,其贡献突出表现于三点。

1. 保持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持续畅通

唐末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必须承认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并未达到阻滞不通的地步,只是其形式和内涵较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发挥着沟通东西的作用,本文所述僧侣的系列活动业已成为 10—13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畅通的一个重要表征。僧侣们的行程路线也成为考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走向的重要观察点,如《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就记述了婆罗门僧人的入华路线:“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

同至京师。永世自云: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⁶⁰文中的大食国为喀喇汗王朝,西州即为今天的吐鲁番,夏州即为今陕西靖边县境内的统万城。婆罗门僧人进入中原的路线较为明确,即从今新疆西部到东天山地区,然后沿河西走廊进入河套地区抵达夏州,由夏州南下进入中原,这也反映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有所变化,灵州路的兴起是较为显著的变化,鄂尔多斯台地边缘的夏州和宥州在维系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这一时期秦州路也并未因吐蕃的影响而完全阻断。⁶¹秦州也是僧侣入贡中原的一个重要经行地点,天圣三年(1025)宋朝就曾下诏秦州限制西来僧侣进贡中原⁶²。总之,在这些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均有丝路僧侣的踪影。

2. 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交流传播

虽然五代及宋代陆上丝绸之路僧侣有着贸易谋利、游历观光等目的,但宗教交流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并且表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以佛教交流为主。上文梳理出五代、北宋时期有南亚、中亚、西域、河西及河湟以及中原地区的僧侣往来于丝路古道之上,他们购买佛教经典、翻译佛经、修建佛寺、交流佛法,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即便是以贸易谋利为主要目的的西来僧人,在客观上也充当了宗教交流者的角色。当然,往来于陆上丝路的不仅有佛教信徒,还有景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宗教信徒,但佛教僧侣占据着主体地位。

二是宗教交流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唐末以来,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回鹘、党项、契丹、吐蕃、鞑靼等多股政治势力交替其间,居民组成较为复杂,但佛教仍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宗教。⁶³

三是在佛教僧侣群体中,以回鹘僧人为主,这是 10—13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宗教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文献所载有龟兹回鹘、沙州回鹘、秦州回鹘、甘州回鹘、西州回鹘等回鹘僧人往来于丝绸之路。这一时期回鹘所居的西域及河西地区佛教盛行,如高昌就是西域地区的佛教中心。北宋初年王延德出使西域的见闻⁶⁴,宋人关于回鹘笃信佛教的记述⁶⁵,以及敦煌石窟中回鹘信息的大量发现⁶⁶,均反映出宋代河西一带回鹘佛教的广泛传播以及沙州在佛教界的中心地位,甚至回鹘及回鹘僧人的体质特征也进

入北宋史家的记录视野：“（太平兴国）九年，扬子县民妻生男，毛被体半寸余，面长、顶高、乌肩、眉毛粗密，近发际有毛两道，软长眉，紫唇、红耳、厚鼻，大类西域僧。至三岁，画图以献。”^⑥《东京梦华录》卷六又载：“回纥皆长髯高鼻，以匹帛缠头，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骆驼，毡兜铜铎入贡。”^⑧《松漠纪闻》亦载：“（回鹘）其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⑨无独有偶，笔者也曾经注意到，在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了深目高鼻的泥俑，初步推测为回鹘僧人的形象。^⑩这些信息足以看出回鹘僧人在内地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由于回鹘与西夏交往较多，在西夏政府机构中专设“回夷务”，应为管理河西走廊回鹘地区民族或宗教事务的机构。^⑪

宋代以降，陆上丝绸之路实际上进入了以回鹘商旅为主导的“回鹘时代”^⑫。上述回鹘僧人在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频繁活动亦可作为重要的佐证，更凸显了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呈现出“回鹘时代”这一鲜明主题。

3. 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

在考察中华文明的形成机制和背景时，学界有一种共识就是中华文明是在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而丝绸之路是外来文明进入中国的唯一陆上通道，10—13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僧侣往来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北宋时期朝廷未能恢复唐王朝在西北地区的版图，这种地缘关系阻滞了宋人对西北乃至域外地理的认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元丰六年（1083）宋神宗与于闐贡使的一段对话：

上问曰：“离本国几何时？”曰：“四年。”“在道几何时？”曰：“二年。”“经涉何国？”曰：“道由黄头回纥、草头达靛、董毡等国。”又问：“留董毡几何时？”曰：“一年。”问：“达靛有无头领、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经由其地皆散居也。”^⑬

这段史料记述了宋神宗向于闐贡使询问入贡中原的路况和见闻。无独有偶，前引文献中亦有宋太祖向中土僧人道圆询问西行风俗地理的信息。这些情况一方面表现出中原皇帝对来朝僧侣的体恤与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即便是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也竟然对陆上丝路通道的地理民俗状况颇显陌生，甚至表现出对西域及域外地理的猎奇心理，因此史家

才记录了如上生动的对话。往来于陆上丝绸之路上的贡使、商人、僧侣成为宋朝了解域外地理及文化状况的重要渠道，他们带来的不仅有异域的商品与物产，也有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信息。10—13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纵然处于低潮与衰落时期，但西来僧侣的宗教交流并未断绝，尤其在“甥舅之谊”的政治背景下，西来僧侣入贡中原，密切了中原政权与西域等地区的政治交往。除了沙门僧侣外，景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宗教徒顺随而来，共生共存，相互影响，带来异域他乡的文化因子，交融于中华文化，由此说明了中华文化可以是一个异质宗教的大熔炉，并形成不会轻易消失的宗教共处传统。^⑭这一传统正是陆上丝绸之路包容开放精神在宗教领域的体现。宋代史籍中多以“胡僧”“西僧”“西域胡僧”来称呼这一时期行走于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僧侣，可见与“胡商”“胡贾”一样，“西域胡僧”业已成为维系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与奔走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其他群体一起，共同见证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注释

①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所编：《全宋笔记》第一编至第十编，大象出版社，2008—2018 年。②有关 10—13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杨蕤：《回鹘时代：10—13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付马：《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日]藤枝晃：《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辛德勇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年；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 年第 1 期；李华瑞：《略论宋夏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等。③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95 页。④②⑦⑫杨蕤：《回鹘时代：10—13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52—54、89—90、281 页。⑤⑨关于宋代龟兹回鹘和西州回鹘所指，学界尚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龟兹回鹘就是西州回鹘，如钱伯泉：《龟兹回鹘国始末》，《新疆社会科学》1987 年第 2 期；田卫疆：《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述》，《西域研究》2003 年第 1 期。⑥《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九年五月，西州回鹘与波（婆）罗门及波斯外道阿里烟朝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 年，第 7714 页。⑦王媛媛：《五代宋初西州回鹘“波斯外道”辨释》，《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⑧陈玮：《公元 7—14 世纪景教在宁夏区域发展史研究》，《敦煌研究》2014 年第 1 期。⑩严耀中：《唐代的婆罗门僧和婆罗门教》，《史林》2009 年第 3 期。⑪②⑥⑩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4103、14103—14104、14106、14105 页。⑫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天竺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236 页。⑬⑭脱脱等：《宋史》卷

四九〇《于阗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4106、14108 页。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太平兴国七年六月丙子”载：“江南始用兵之年，有中竺摩伽陀国僧法天者至鄜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第 522 页。⑮顾吉辰先生梳理了史籍所载回鹘、龟兹、瓜沙二州、于阗、高昌、吐蕃等地区的僧侣二十余名。参见顾吉辰：《北宋蕃僧考实》，《史学集刊》1987 年第 1 期。童玮先生遗作《北宋佛教史年表》中以编年形式将周边及域外僧侣活动的记录进行列举，但未对僧侣的来源路线进行说明，不少僧侣是从海路进入中原。参见童玮：《北宋佛教史年表（960—1127）》，《佛学研究》1997 年第 6 期。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 年，第 7768、7721、7715、7767、7758、7720、7851、7768、7768、7891、7722、7852、7717—7718 页。⑳㉑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4115、14117 页。㉒㉓杨蕤：《略论西夏的西缘疆界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㉔史籍对道圆西行的时间记述略有不同，有 18 年和 20 余年之说。《宋史》记载道圆“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共为 18 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十一月戊午”载：“先是，沙门道圆出游西域二十余年，于是，与于阗朝贡使者俱还，献贝叶经及舍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61 页。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十一月癸卯”载：“先是，僧行勤游西域，上因赐大食国王书以招怀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13 页。㉖《宋史·于阗传》载：“（于阗）国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4107 页。㉗㉘[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82、584 页。㉙马卫集：《马卫集论中国》，胡锦涛、田卫疆译，周锡娟校，《中亚研究资料》1985 年增刊。㉚[日]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钱婉约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33—142 页。㉛杨蕤：《北宋时期经济思想的转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 期。㉜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一〇八，蔡襄《福州五戒》，《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书店，1989 年，第 13 页。㉝庄焯：《鸡肋编》卷中，《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七册，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64 页。㉞薛志清：《论宋代僧尼的经商活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㉟[法]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81 页。㊱《宋史·贾昌朝传》载：“西域

僧献佛骨、铜像，昌朝请加赐遣还，毋以所献示中外。”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五，中华书局，1977 年，第 9614 页。㊲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九，《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17 年，第 197 页。㊳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567 页。㊴刘迎胜：《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1 年第 2 期。㊵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5 页。㊶庄焯：《鸡肋编》卷上，《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七册，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40 页。㊷㊸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年，第 37、36—37 页。㊹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中华书局，1989 年，第 3919—3920 页。㊺孙升：《孙公谈圃》卷中，《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155 页。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癸酉”载：“礼宾院言回纥僧哈尚贡奉赴阙，乞赴五台山瞻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643 页。㊼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六，《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五册，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16 页。㊽《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七载：“西天大天（竺）国僧迦罗吃哆乞宣取所游历诸处画《名山百花图》及御马等，诏令于内东门司投进。”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 年，第 7858 页。㊾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二，《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97 页。㊿杨蕤、王润虎：《略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宁夏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④王延德：《西州使程记》，杨建新编：《古西行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60 页。⑤⑥洪皓：《松漠纪闻》，《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七册，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118、117 页。⑦刘玉权：《关于沙洲回鹘洞窟的划分》，《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年，第 1—29 页；杨富学、牛汝极：《安西榆林窟 25 窟前室东壁回鹘文题记译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18 页。⑧脱脱等：《宋史》卷六十二《五行》下，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66 页。⑨杨蕤：《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宁夏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⑩史金波：《西夏社会》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9 页。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元丰六年五月丙子”，中华书局，2004 年，第 8061 页。⑫严耀中：《来华的“夷教”与婆罗门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王 轲

Monks and Priests on the Land Silk Road and Culture-interaction During 10-13 Centuries

Yang Rui Tian Wen

Abstract: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w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Land Silk Road during 10-13 centuries. Monks and priest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Helong, Hehuang, South Asia and Central Asia entered the Central Plains for trading, religious or diplomacy practices. Buddhist monks, Buddhists of Brahmanism Nestorianism and Manicheism unblocked the west and the east in the context of decline of the Land Silk Road, as well as contributing to religious exchange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West during Five Dynasties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Furthermore, it also saw the contribution of monks in concentrating strength, communicating China and west.

Key words: Five Dynasties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Land Silk Road; monks; cultural exchanges